

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及其对 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

张永蓬 刘昱函

内容提要 民族国家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民族国家构建是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同步进行的过程。尼日利亚是非洲重要国家，但它是一个由多块英国殖民地“拼成”的国家，迄今只有60余年的历史，其民族国家构建进程尤为艰难复杂。其中，比夫拉分离主义长期存在，并以战争或运动的形式体现出来，成为影响尼日利亚国家统一和稳定，以及民族国家构建的重大问题或挑战。殖民统治的遗祸、部族主义的危害和利益争夺的影响，是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比夫拉战争在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说避免了国家分裂，维护了国家统一。但是，这场战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创伤，成为伊博族和许多东南部少数民族沉重的历史记忆，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起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重新兴起的根源。

关键词 尼日利亚 比夫拉分离主义 比夫拉战争 民族国家构建

作者简介 张永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102488)；刘昱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生(102488)。

民族国家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民族国家构建是民族构建与国家构建同步进行的过程。民族构建是指一个国家内存在的多个民族和不同文化致力于建设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即国家民族的过程；国家构建则是指领土和行政资源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A类项目“民族问题与非洲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8XYFA01)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政治整合。^① 对于非洲而言，民族国家统一构建是指完成去殖民化的任务后，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国家政治一体化演进与各民族文化一体化融合，使自己得以“作为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而生存下来，并在这样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基础上去追求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② 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复杂因素的挑战和威胁，其中分离主义是最大威胁之一。

作为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尼日利亚国情尤为复杂，民族、宗教、政党问题错综复杂，历史上大选危机、权力斗争、政权更替、政局动荡时有发生，人民总体贫困、社会贫富分化、政府腐败低效，对民族国家构建而言都构成严峻挑战。其中，比夫拉分离主义长期存在，并以战争或运动的形式体现出来，成为影响尼日利亚国家统一和稳定，以及民族国家构建的重大问题或挑战。

尼日利亚于 1960 年 10 月独立，迄今只有 60 余年的历史，是一个由多块英国殖民地“拼成”的国家。从区域划分上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北部以豪萨—富拉尼族为主，多信奉伊斯兰教；东南部以伊博族为主，多信奉基督教；西南部以约鲁巴族为主，也是多信奉基督教。该国民族、宗教问题异常复杂，民族国家构建过程尤为艰难。其中，1967—1970 年的比夫拉战争对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影响深远。“比夫拉”（Biafra）一词来自比夫拉湾，是西非大西洋沿岸几内亚湾的最深海湾，比夫拉共和国便以此命名。独立后的尼日利亚并没有成功构建起一个和平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多次发生军事政变和民族冲突，存在严重的分离主义倾向。比夫拉战争的目标便是从尼日利亚分离出来，在东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伊博族比夫拉国家。战争最终以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获胜宣告结束，战后联邦政府采取了民族和解政策，缓和民族矛盾，维护民族团结。然而，这些举措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尼日利亚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也未能完全消除分离主义倾向。以“比夫拉原住民组织”（Indigenous People of Biafra, IPOB）为代表的比夫拉分离主义势力有抬头趋势，成为尼日利亚国家安全和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威胁。

当前国内对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或简称“比夫拉运动”）的研究明显不足，大多停留在内战时期，而没有关注近年来比夫拉运动的新发展。国外研究关注了战争后延续至今的比夫拉运动，指出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中的短板，认为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在战争中滥用暴力，^③ 在经济建设上忽视东南部利益，^④ 在政

① 李捷：《南苏丹现状研究：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亚非纵横》2013 年第 4 期，第 9 页。

② 刘鸿武：《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国家统一构建进程》，《西亚非洲》2002 年第 2 期，第 16 页。

③ Olalekan Waheed Adigun, “Repression of the Neo – Biafra Movement – Measures, Respons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Studies*, Vol. 5, No. 2, 2018, p. 132.

④ Michael I. Ugwueze et al., “Countering the Dismemberment Narrative of Biafra Secessionist Agitations in Nigeria,” *African Renaissance*, Vol. 17, No. 3, 2020, p. 89.

治参与中排除伊博族人,^① 导致伊博族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被边缘化, 受到不公正对待, 成为比夫拉分离主义的根源。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比夫拉问题的原因, 但是忽视了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在民族国家构建上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因此, 本文旨在从非洲国别研究的角度出发, 深入分析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产生的历史原因、表现形式、发展演变, 以及对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

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产生的主要原因

独立前尼日利亚存在众多部族, 这些部族的早期文明缺乏联系, 历史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国家民族”概念。尼日利亚境内, 并没有通过群体间的交往互动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 历史上只有一些规模大小不一、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古代王国、酋长国或城邦等, 如北方的博尔努王国、豪萨七邦, 南方的伊费王国、贝宁王国等。每个王国都独立运作, 各有自己的政治结构、文化传统和社会模式。^② 各部族间存在利益冲突和多方面差异, 彼此交往、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足以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尼日利亚独立后成为主权国家, 确定了领土范围, 并建立起一套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但是由于尼日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缺乏长期的历史文化基础, 并且国内民族众多, 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全体人民同属一个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尼日利亚从英国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仅仅意味着建立了民族国家的基本形态, 仍然面临着培育国内民族主义认同的艰巨任务。德拉诺瓦称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民族主义为“无民族的民族主义”,^③ 尼日利亚的情况与此相类似。这种政治民族的形成是因为旧殖民地边界划分, 既不是基于单一的民族, 又不具备共同的历史文化基础, 往往无法抵御分离主义思潮。“分而治之”的殖民统治激化了民族矛盾, 在尼日利亚独立初期发生了多次针对伊博族的暴力冲突事件, 此后“人口普查危机”激化了对国家权力的争夺, 与石油利益密切相关的“建州计划”损害了伊博族的经济利益, 最终导致比夫拉战争爆发。

① Idowu Johnson and Azeez Olaniyan, “The Politics of Renewed Quest for a Biafra Republic in Nigeria,”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Vol. 33, No. 4. 2017, pp. 327 – 330.

② Douglas A. Phillips, *Nigeria*,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4, p. 33.

③ [法] 吉尔·德拉诺瓦: 《民族与民族主义: 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 郑文彬、洪晖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第 109 页。

（一）殖民统治的遗祸

在对西非殖民地的争夺过程中，法国占领了塞内加尔、几内亚、马里、尼日尔、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象牙海岸（今科特迪瓦）、达荷美（今贝宁）等国，英国则占领了尼日利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塞拉利昂、冈比亚等国，其中尼日利亚是英国在西非最大的殖民地。1861年，英国建立了拉各斯殖民地，并以此为据点向尼日利亚内陆扩张，建立了南方和北方两个殖民地。1914年1月1日，英国宣布将两个殖民地合并为统一的“尼日利亚殖民地与保护国”，这成为尼日利亚现代国家的基础。和大多数非洲国家一样，尼日利亚的边界由殖民统治者划定，完全不顾非洲人民的意志和非洲国家的实际情况。而且，英国殖民政府采取惯用的“分而治之”统治政策，意在激化民族、宗教、地区矛盾，制造仇恨和对立，让当地人民相互争斗，以此维护和延长殖民统治。

在殖民统治区域划分上，由殖民统治者划分的尼日利亚各区之间相互分立、相对自治。1947年开始实施的《理查兹宪法》正式提出在尼日利亚实现“地区分治主义”的原则和政策，将尼日利亚分成三部分，即北区（以豪萨—富拉尼族为主）、西区（以约鲁巴族为主）和东区（以伊博族为主）。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每个区都设有自己的议会。这种将殖民地政治结构分而治之的做法，一方面可以削弱殖民地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力量，造成各区间的矛盾与隔阂，另一方面便于英国对殖民地的控制。^①

在殖民统治方式上，英国在尼日利亚推行间接统治方式，利用当地酋长及各部族上层分子，充当殖民地行政机构官员，作为殖民当局统治各族人民的工具，此举可以缓解或缓冲殖民主义者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并且把由殖民统治造成的矛盾转移或转嫁为殖民地人民内部矛盾。在部队军官的选拔中，接收西方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伊博族人往往具有优势，而普通军人则来自北区的士兵居多。军官与士兵的等级差异与部族矛盾叠加，为尼日利亚军队内部冲突埋下伏笔。^②

在殖民统治教育上，南方地区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西式教育和基督教得到大力推广，而北方地区仍然保留了豪萨语和传统教育，从而在民族、宗教、地区差异的基础上，又造成北方穆斯林与南方基督徒之间的教育差异和文化对抗，加剧了分裂危机。

① 刘鸿武等：《尼日利亚建国百年史（1914—2014）》，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页。

② 陈嘉雷：《尼日利亚民族主义百年嬗变（1914—2014）》，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39页。

(二) 部族主义的危害

尼日利亚是世界上民族构成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境内大大小小的有 250 多个部族,其中豪萨—富拉尼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为三大主要部族。^① 在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无论是总统、议会选和地方选举,还是行政区划、人口普查、市政管理,部族主义的影响无处不在,如何克服部族主义的阻碍和危害,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甚至是核心问题。因此,尼日利亚历届政府,无论是文官政府还是军人政权,都把克服部族矛盾和维护国家统一作为重要目标,都致力于实现国家的普遍和解,铲除部族主义,追求尼日利亚国家的一体化和民族团结。^②

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是国家民族认同的一个高峰,然而在斗争胜利后民族主义的感召力大幅下降甚至消失,民族矛盾成为尼日利亚国内的主要矛盾。在尼日利亚独立之前,三大地区、三大部族各自高度自治,相互之间的矛盾相对较少或者被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掩盖起来。在取得独立之后,三大地区、三大部族之间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民族对立、不满和仇视日趋严重,导致 1966 年发生两次军事政变以及严重的部族冲突事件,并最终使尼日利亚陷入长达近三年的内战,从而完全改写了这个国家的历史。

1966 年 1 月,伊博族军官发动血腥的军事政变,杀死了来自北方豪萨族的阿布巴卡尔·巴勒瓦(Abubakar Balewa)总理,不少豪萨族和约鲁巴族高官也被杀死,使这场政变具有明显的部族矛盾色彩。仅半年之后,豪萨族军官又发动军事政变,杀死了军政权领导人约翰逊·阿吉伊—伊龙西(Johnson Aguiyi—Ironsi)和一批伊博族军官,并在北方掀起了大规模驱逐和屠杀伊博族人的浪潮,致使成千上万的伊博族人被杀,大批伊博族人逃回东区。“在非洲社会阶级关系不明显的状态下,当民众遇到危机时更加倾向于向传统的政治认同即部族来寻求庇护,数十万的伊博族人开始从其他地区涌入伊博族传统居住的东南部地区。”^③ 保护公民的生存与安全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任务和职责所在,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履行保卫公民生存与安全的基本职能,人民因为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失去安全感,那么这个国家的合法性将会丧失,甚或陷入巨大危机之中。

① 学界对非洲国家“民族”或“部族”的称谓存有争议,为了避免混淆,本文在一般情况下仍使用“部族”称谓,以及相对应的“部族主义”一词。

② Sam Oyovbaire, *Foundations of a New Nigeria: the IBB Era*, Lagos: Precision Press, 1991, p. 5.

③ [英]休·西顿·沃森:《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吴洪英、黄群译,中央民族大学 2009 年版,第 467 页。

(三) 利益争夺的影响

对于尼日利亚这样一个国家而言,严重缺乏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缺少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尤其是历史基础。人们往往只有部族观念和地区观念,而没有国家观念;只有部族利益和地区利益,而没有国家利益。不同民族、宗教、政党、地区之间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争夺非常激烈,由此导致的矛盾、冲突和战乱频发,严重威胁民族国家构建进程。

1962—1964年人口普查危机反映了各部族对联邦权力的激烈争夺。根据英国殖民者设计的议会制度安排,尼日利亚议会众议院席位根据各地区人口多少按比例划分。如果一个部族在人口普查中被登记更多的人口,就意味着其能够在众议院席位分配中更占优势,获得更多的权力。独立初期尼日利亚的民族融合程度较低,一个部族在联邦政府中掌握的话语权往往与本部族利益直接挂钩。因此,人口普查成为各部族、各党派、各地区进行斗争的焦点。1962年和1963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连续组织了两次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普查。为了获得更多的议会席位,各部族大都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本族的实际人口数量,以至于人口增长数量完全超越了人口自然增长率。^①各方相互指责对方数据作假,从而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1962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后,为了避免国内局势恶化,巴勒瓦总理宣布取消此次普查结果,并于1963年举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结果仍然显示北方人在数量上远超南方人。这场人口普查论战彻底演变为政坛乱局,加剧了部族矛盾和对立。人口普查危机反映了尼日利亚各部族间政治权力分配不均状况,伊博族认为北方豪萨—富拉尼族在政治上占据支配地位,本族则日益处于弱势和边缘化境地,由此导致分离主义倾向增长。

如果说人口普查危机加剧了部族矛盾和对立,那么“建州计划”则成为比夫拉战争的导火索。1967年,雅库布·戈翁(Yakubu Gowon)政府提出“建州计划”,原来的北区、东区和西区(以及后来设立的中西区)被取消,全国重新划分为12个州,其中北区6州,西区2州,东区3州,加上首都所在的拉各斯州。该计划的初衷是为了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力,分散大部族的力量,平衡各部族势力,缓和各部族紧张关系,从长远来说有利于民族国家构建。但是,在伊博族看来,该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严重危及他们的生存,最终走上了谋求分离的战争之路。

根据“建州计划”,原来由伊博族控制的东区被划分为3个州:河流州、东

^① S·A·Aluko, “How Many Nigerians? An Analysis of Nigeria’s Census Problems, 1901–63,”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3, No. 3, 1965, p. 373.

南部州和中东部州。伊博族主要被划在了中东部州，另外两个州则由一些中小部族主导。如此一来，伊博族不仅失去了对两州的控制力，而且失去了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重要的港口和出海口。因为尼日利亚主要的油气田都位于其他两州，该国第二大港口和石油工业中心哈科特港（Harcourt Port）也被划归河流州。因此，“建州计划”被伊博族视为一场政治阴谋，意在打压削弱伊博族，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是一场关乎本族存亡的斗争。

“建州计划”引燃了尼日利亚长期积累的部族、教派和地区矛盾，成为内战的导火索。1967年5月30日，东区军事长官伊博族人沃杜梅古·奥朱古（Odumegwu Ojukwu）宣布东区脱离尼日利亚联邦，成立独立的“比夫拉共和国”（Republic of Biafra），以埃努古（Enugu，今埃努古州首府）为“首都”。同年7月，尼日利亚联邦军队向比夫拉发动军事进攻，比夫拉战争全面爆发，也被称为“尼日利亚内战”。

比夫拉战争及外部干涉

比夫拉战争持续了两年半，到1970年1月结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对于战争及饥饿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不同的研究有各相差异的数据，较为广泛采用的是共造成大约100万伊博族人死亡。^①不仅有大量的战斗人员伤亡，而且由物资封锁引发的饥荒疾病和比夫拉军队内部的清洗运动也导致大量人员伤亡。此外，在当时冷战背景下，比夫拉战争不可避免地成为大国争霸的角斗场，域外势力分别支持战争的对立方，大大延长了战争进程，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和更大的战争创伤。

在战争初期，比夫拉军队向西进发，对临近的中西部发起大规模进攻，因为没有遇到联邦军队的有力抵抗，很快就占领了中西部。此后，联邦政府紧急动员调派大批军队进行反击，不仅恢复了对中西部的控制，而且深入比夫拉地区，占领了比夫拉“首都”埃努古，控制了主要城市、港口和油田，切断了比夫拉与外界的联系，使比夫拉处于孤立崩溃边缘。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与比夫拉当局在伦敦、坎帕拉、亚的斯亚贝巴等地举行谈判，但是无果而终。

除了军事对抗，封锁禁运是联邦政府削弱比夫拉的另一重要手段。在战争爆发后不久，联邦政府就对比夫拉进行物资封锁，对所有进出比夫拉的船只实行禁运，随后将封锁禁运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石油，这导致比夫拉资源短缺和大规模饥

^① Chima J Korieh, “Biafra and the Discourse on the Igbo Genocide,”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48, No. 6, 2013, pp. 730 – 740.

荒。在埃努古被联邦军队攻下后，奥朱古被迫将总部迁至乌穆阿希亚（Umuahia，今阿比亚州首府）。1968年5月，联邦军队占领了比夫拉唯一的海上交通航道哈科特港，这对比夫拉造成沉重打击，只能依靠搭建临时机场接收外部物资援助。这些临时机场成为比夫拉与外界联系的生命线，所有的物资，包括武器、弹药和食物都只能通过临时机场运入。然而，这些物资根本无法满足比夫拉军队和民众的需求，许多人死于封锁禁运导致的饥荒和疾病。

在战争后期，比夫拉不仅在与联邦政府的战斗中节节败退，其内部也存在严重危机。奥朱古时常把战场上的失败责任归咎于他手下的军官，称他们是“破坏者”，因此被降级甚或枪毙，对比夫拉军队的士气造成“灾难性的影响”。^① 奥朱古不仅不信任曾在联邦政府任职的伊博族人，还担心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会叛变或者推翻自己，于是在比夫拉军队内部进行了多次清洗运动，造成人心惶惶，战斗力大大下降。奥朱古虽然组建了由他亲自指挥的S旅和由德国雇佣兵指挥的第四突击队，但已经无法挽回败局。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冷战背景下，英国、法国、美国以及苏联等外部势力出于冷战需要和各自的利益考虑，对尼日利亚内战进行干涉，增加了这场战争的复杂性、困难性和长期性。英国是尼日利亚的前殖民宗主国，是尼日利亚国家的“创造者”，对解决比夫拉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它支持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尽快平息战争，维持一个统一的尼日利亚。与英国相对，法国公开表示支持比夫拉共和国，向其提供道义、外交和军事上的支持。冷战中的两个最主要对手，苏联支持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并向其出售武器，美国表面奉行中立政策，实则在战争初期倾向于支持比夫拉，给予其一定的援助，扶植伊博族亲美势力，但是在后期随着战争形势变化，又选择疏远并最终放弃比夫拉。

以法国为例，它所持的立场和政策大大增加了比夫拉问题的复杂性。1968年9月，法国总统戴高乐宣布，法国将承认比夫拉共和国，并向其提供帮助。^② 世界上像这样公开宣布支持比夫拉的国家并不多，其原因或考虑有多方面。

一是历史因素。法国与英国均为殖民主义大国，为在非洲乃至全球争夺殖民地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激烈斗争，即使在非洲国家陆续取得独立后，双方的对立和争夺仍在继续。在比夫拉问题上，两国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和政策。法国公开支持比夫拉，认为战争是针对伊博族的种族灭绝行为，希望尼日利亚分裂瓦解。与之相反，英国支持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认为其不存在种族灭绝意图及行

① Pradeep Barua, *The Military Effectiveness of Post - Colonial States*, Boston: Brill, p. 18.

② Suzanne Cronjé, *The World and Nigeria: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Biafran Civil War, 1967 - 1970*,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1972, pp. 194 - 195.

为，希望尼日利亚维护统一。可以说，法国和英国在比夫拉问题上的分歧对立不是源于这一问题本身，而是源于两国长期以来的对立关系以及对非洲的争夺。

二是地缘政治因素。法国在非洲拥有广阔的殖民地，它们在独立后仍然与法国保持特殊关系，而尼日利亚曾是英国在西非地区的殖民地，一个统一强大的尼日利亚不利于法国在西非的地位、影响力乃至控制力，不符合法国在西非的利益。因此，法国支持比夫拉独立，若能取得成功，不仅可以分裂瓦解尼日利亚，还可以削弱英国在西非地区的影响力。

三是现实利益因素。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尼日利亚大量开采石油，其丰富的油气资源随之成为域外大国争夺的重点。作为尼日利亚前殖民宗主国，英国石油公司在尼日利亚油气资源开发中占据优势地位，而法国石油公司仅占一小部分。比夫拉战争为包括法国在内的大国重新争夺划分尼日利亚油气资源提供了机会。法国通过支持比夫拉战争，试图不仅能够改变尼日利亚政治版图，还能改变尼日利亚油气资源开发格局，使法国赢得优势甚至主导地位。法国对比夫拉的支持曾得到一定程度的回报，例如奥朱古政权为了得到法国罗斯切尔德银行 600 万英镑的贷款而抵押了 10 年内比夫拉境内的所有矿产资源。^① 但是，随着比夫拉共和国溃败，法国的意图几近全部落空。

有评论指出，“如果没有法国的军事援助，比夫拉可能在 1968 年就会崩溃。”^② 可见，英国、法国等大国作为外部势力干预比夫拉问题，干涉尼日利亚内政，不仅延长了比夫拉战争，增加了地区局势的复杂性，而且加剧了大国紧张关系，从根本上说不利于尼日利亚乃至非洲的和平、安全与发展利益。

比夫拉战后民族和解政策

1970 年 1 月，尼日利亚联邦军队攻占比夫拉最后的据点奥韦里（Owerri，今伊莫州首府），奥朱古逃亡象牙海岸（今科特迪瓦）。随后，比夫拉军队参谋长菲利普·艾菲翁（Philip Effiong）与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在首都拉各斯签署停战协议，结束了长达两年半的内战。这场战争在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史上具有重要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说避免了国家分裂，维护了国家统一，使伊博族人重新接受尼日利亚人的身份，尽管这种认同对一些人而言带有强制性的成分。^③ 但是，这场战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创伤，成为伊

① Joseph Okpaku, *Nigeria: Dilemma of Nationhood*, New York: Third Press, 1972, p. 336.

② Pradeep Barua, *The Military Effectiveness of Post-Colonial States*, p. 17.

③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0—291 页。

博族和许多东南部少数民族沉重的历史记忆，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重新兴起的根源。比夫拉战争结束后，尼日利亚联邦政府采取积极的民族和解政策，进行战后重建，促进民族国家构建。

（一）实行民族和解政策

比夫拉战争结束后，尼日利亚联邦政府制定和实施了民族和解政策，没有追究比夫拉方面的战争责任，包括高层军官和普通士兵。联邦政府声称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也无失败者”，出台了“和解、复兴和重建”（Reconciliation, Rehabilitation and Reconstruction）政策。1970年1月15日，戈翁发表题为《民族和解的黎明》广播讲话，承诺对那些“被误导而反叛的人”实行大赦，同时展开大规模的救济行动，为受战争影响的人们提供食物、住所和药品等。^①

在“和解、复兴和重建”政策的指导下，比夫拉前领导人并没有被审判和惩罚，而是得到赦免。联邦政府成立了军官委员会，对大约150多名比夫拉军官进行审查，一些人被尼日利亚军队重新吸收。联邦政府还努力确保伊博族平民不会被当作战败的敌人对待。^② 战败后逃亡的比夫拉领导人奥朱古也于后来回国，还以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了尼日利亚2003年大选，但以失败告终，于2011年去世。

除此以外，联邦政府还致力于增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融合。1973年7月，尼日利亚启动了国家青年服务计划（the National Youth Service Corp），目的在于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其他州而非原籍州工作，这样不仅有利于加强青年人对其他地区和民族的了解，也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从国家层面而言，青年服务计划对于促进比夫拉战争后民族和解与民族国家构建具有积极作用。

（二）进行经济重建

为恢复战争中被破坏的基础设施，戈翁政府成立了国家复兴委员会（the National Rehabilitation Commission），主要负责战后重建工作。到1971年底，共投入约2.4亿奈拉的资金用于重建。^③ 在中东部州，工业部和农业部主要负责执行

① General Yakubu Gowon, “The Dawn of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January 15, 1970, <https://dawodu.com/articles/the-dawn-of-national-reconciliation-gowons-victory-message-to-the-nation-1385> [2022-03-08].

② Adewunmi James Falode and Joshua Olusegun Bolarinwa, “A Reconstructor and Nation - Builder: General Yakubu Gowon and Socio -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Nigeria, 1966 - 1975,” *Nigerian Forum*, Vol. 40, Nos. 3 - 4, 2019, pp. 5 - 6.

③ Ibid., pp. 6 - 7.

重建计划，受到战争破坏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以及医院、学校等逐步恢复，大多数制造业也在 1973—1974 年间基本恢复。联邦政府还开始建造石油精炼厂，铺设从南方港口哈科特港向北方重镇卡杜纳运送原油的管道。

在商业领域，恢复被战争摧毁的市场是尼日利亚东南部经济重建的核心。为此，联邦政府提供了特别拨款，包括该地区最大、最现代化的奥尼查（Onitsha）市场在内的许多市场得以重建。1970—1971 年，共重建了约 230 个市场，包括 29791 个商店、货摊；1971—1972 年，共重建或新建了 72 个市场，包括至少 600 个商店和 800 个货摊。^① 市场重建有利于恢复市场秩序，加快重建进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人们对未来的信心。

（三）继续调整行政区划

比夫拉战争后，尼日利亚加强行政区划调整，进一步推行“建州计划”，设立了更多的州，同时将首都从拉各斯迁址阿布贾，这些都成为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步骤和措施。

撤区设州在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在“建州计划”设立 12 个州的基础上，1976 年尼日利亚新增设 7 个州，此后又经过 1987 年、1991 年和 1996 年三次行政区划调整，最终确立为总共 36 个州和 1 个联邦首都区。这种行政区划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各地区平衡发展，给予少数民族更大的自治权，避免少数民族被主体民族压制。

决定迁都对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也具有重要意义。拉各斯是英国在尼日利亚最早的殖民地，是全国第一大港口和工业中心，人口过于稠密，城市拥堵不堪，新建或扩建的空间不足。从地理位置上说，拉各斯偏居尼日利亚西南部，与全国其他地区联系不便。从安全上说，拉各斯靠近动荡不安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安全与治安形势堪忧。从民族平衡上说，拉各斯位于约鲁巴族地区，对其他两大主体民族来说“有失公允”。因此，从安全、发展以及民族平衡等方面考虑，联邦政府决定将首都从拉各斯迁至阿布贾，这是对尼日利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项重大决定。阿布贾处于尼日利亚全国地理中心，不偏不倚，易被各民族、各地区接受。1975 年，穆罕默德（Murtala Muhammed）军政府提出兴建新首都的建议。1979 年 10 月，沙加里（Shehu Shagari）文官政府正式批准新首都阿布贾的设计蓝图，并开始第一期建设工程。1991 年 12 月，巴班吉达（Ibrahim Babangida）军政府将首都从拉各斯迁至阿布贾。

^① Paul Obi - Ani, *Post - Civil W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of Igboland, 1970 - 1983*, Nsukka: Great AP Express Publishers Ltd, 2000, pp. 48 - 49.

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新发展

比夫拉战争后的民族和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民族关系，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推动民族国家构建。但是，战争的影响长期存在，战争造成的创伤难以在短期内愈合。由于政权更迭频繁，石油价格下跌导致资金不足，腐败问题严重等，尼日利亚民族和解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伊博族认为受到不公正对待，安全和发展利益得不到保障，在社会上处于边缘化地位，从而为分离主义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空间。

政治上，伊博族认为日益被边缘化。比夫拉战争后，从未有伊博族人担任国家领导人。在联邦政府的重要职位中，伊博族与其他两个主体民族的比例也是很不平衡。据统计，自1999年尼日利亚第四共和国成立以来，军队和警察部门仅各有一名伊博族人担任要职，并且都是在乔纳森（Goodluck Jonathan）总统执政期间。^①在联邦政府中缺少本族人任职，让伊博族人不仅感到代表性和公正性不足，而且认为自身利益缺乏保障。

经济上，伊博族认为本地区发展遭受忽视。伊博族所在的东南部是尼日利亚石油产区，是国家经济命脉之所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地。但是，伊博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被联邦政府忽视，单一经济结构难以改观，基础设施落后，环境污染严重，电力供应不足，教育、医疗资源匮乏，安全形势堪忧，人民生活困难。以基础设施为例，尼日尔河的疏浚、内陆港的建设、哈科特港的现代化升级改造等，似乎都无限期地停留在规划阶段。^②

法律上，伊博族认为受到不公正对待。例如，比夫拉战争前后，大批伊博族人从北方逃往东南部，大量财产尤其是房产仍留在北方。但是，尼日利亚《废弃物法》规定，各州有权没收伊博族人所谓的“废弃财产”，即战争期间伊博族人遗留的财产，允许当地人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伊博族人的房产。再如，1972年颁布的《尼日利亚企业促进法》（亦称《本土化法》），限制外国资本控制尼日利亚经济，将石油资源国有化。但是在伊博族看来，这项法规在执行过程中严重偏

① Idowu Johnson and Azeez Olaniyan, "The Politics of Renewed Quest for a Biafra Republic in Nigeria,"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Vol. 33, No. 4, 2017, pp. 327 - 330.

② Ikenna Mike Alumona, Stephen Nnaemeka Azam and Emeka Charles Iloh, "The Nigerian State and the Resurgence of Separatist Agitations: The Case of Biafra," p. 11, <https://afriheritage.org/pdf/working/The - Case - of - Biafra. pdf> [2022 - 03 - 08].

祖另外两个主体民族豪萨—富拉尼族和约鲁巴族。^① 位于本地区的石油资源并没有给伊博族带来财富和发展,相反带来的是诅咒和灾难。

总而言之,比夫拉战争及战后民族和解政策均未完全根除地方分离主义,而是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成为威胁尼日利亚国家统一、民族融合以及民族国家构建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些比夫拉运动组织不断涌现,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实现比夫拉主权国家运动”(The Movement for the Actualization of the Sovereign State of Biafra, MASSOB)和“比夫拉原住民”组织(Indigenous People of Biafra, IPOB)。此外,还有比夫拉复国主义运动(the Biafra Zionist Movement, BZM)、下尼日尔河大会(the Lower Niger Congress, LNC)等组织,但它们的影响力都不及前两个。

1999年对尼日利亚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经历了长期的军政府统治之后,尼日利亚实现了“还政于民”,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民选政府开始执政,但是就在同年,“实现比夫拉主权国家运动”分离主义组织成立,其领导者为拉尔夫·乌瓦祖鲁伊科(Ralph Uwazuruike),总部位于伊莫州。2013年,另外一个分离主义组织“比夫拉原住民”成立,其领导者为纳姆迪·卡努(Nnamdi Kanu)。值得注意的是,该组织是在德国成立,在英国有自己的电台,在尼日利亚开展分离运动。

“实现比夫拉主权国家运动”宣称自己是和平组织,以圣雄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为斗争哲学或指导原则,通过“25步计划”谋求比夫拉独立。该组织使用原来比夫拉共和国的旗帜,试图重新发行比夫拉货币,颁发比夫拉护照,还成立了“比夫拉流亡政府”和“比夫拉影子政府”。

“比夫拉原住民”同样以实现比夫拉独立为目标,主张通过公民投票方式实现独立。该组织宣称,生活在比夫拉地区的人们是比夫拉人,而非尼日利亚人,而自己是能够代表尼日利亚境内及海外比夫拉人政治、经济及社会利益的组织。该组织认为,在豪萨—富拉尼族控制下的尼日利亚,比夫拉人处于被占领和奴役的状态,而且比夫拉地区和尼日利亚其他地区之间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因此不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该组织还宣称比夫拉人是非洲的犹太人,他们与犹太人有共同点:同样经历过种族屠杀,同样为了争夺土地和权力而与穆斯林作战。

“比夫拉原住民”在英国伦敦设有比夫拉电台(Radio Biafra),或称比夫拉之声(Voice of Biafra),宣传比夫拉独立运动。该电台还善于利用新媒体,拥有自己网站和社交媒体账号等,宣传内容主要包括比夫拉战争、比夫拉独立运动、

^① Benjamin Maiangwa, “Revisiting the Nigeria – Biafra War: The Intangibles of Post – War Reconcili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 Vol. 33, No. 4, 2016, pp. 49 – 50.

以及对尼日利亚政府的批评和丑化等。有证据表明,关于比夫拉战争的纪录片在媒体和社会上传播,吸引了更多的分离主义支持者。^①比夫拉电台被指控煽动仇恨、分裂与战争,对尼日利亚国家安全稳定和民族团结产生了负面影响。

“实现比夫拉主权国家运动”和“比夫拉原住民”均宣称自己是和平的、非暴力的组织,通过集会、游行、罢工、静坐等方式向尼日利亚政府表达诉求,进行抗议示威,谋求比夫拉独立。2017年5月30日,在纪念比夫拉共和国宣布独立50周年之际,比夫拉分离主义组织发起“居家静坐”(sit-at-home)运动,要求人们必须“待在家里”,市场、商店、银行、学校、加油站、快餐店等均被关闭,交通无法正常运转,路上和大街上空空荡荡,致使尼日利亚东南部许多地区的经济社会活动陷入停滞状态。

近年来,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不断升级。2020年12月,“比夫拉原住民”组建了拥有武装的“东方安全网络”(Eastern Security Network, ESN),这被尼日利亚政府视为准军事组织,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已经超出了非暴力范畴。“比夫拉原住民”领导者卡努不时发表煽动暴力的言论,例如他声称比夫拉人民需要“枪和子弹”。卡努还表示,“如果比夫拉伊博族各州得不到解放,他们将把尼日利亚夷为平地。”^②随着矛盾对立加剧,分离组织及其支持者与联邦政府军警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政府指控分离主义组织诉诸暴力,袭击政府机构、安全部门、选举办公室、宗教场所等。仅在伊莫州,“比夫拉原住民”武装分子就袭击杀害了128名安全人员。但是该组织予以否认,称“东方安全网络”旨在保护当地农民免受强盗和富拉尼牧民的袭击,他们仍然致力于非暴力解决方案,无意对抗尼日利亚安全部队。^③分离主义组织进而指控尼日利亚政府肆意逮捕和杀害其成员及支持者,声称仅在1999—2008年间就有2020名成员被政府军警杀害。2016年比夫拉共和国纪念日,尼日利亚安全部队对阿南布拉州首府奥尼查的抗议示威人群开火,造成60多人死亡,使当地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比夫拉分离主义组织坚称自己并非恐怖组织,而是合法守法的政治团体,追求国家宪法规定的言论、行动、宗教、结社自由等,不应该遭到政

① Michael I. Ugwueze, “Biafra War Documentaries: Explaining Continual Resurgence of Secessionist Agitations in the South – East, Nigeria,” *Civil Wars*, Vol. 23, No. 2, 2021, p. 207.

② “‘Goodluck Jonathan Is an Igbo President of Nigeria’ – Radio Biafra,” NewsRescue, January 10, 2014, <https://newsrescue.com/breaking-goodluck-jonathan-igbo-president-nigeria-radio-biafra/> [2022-04-10].

③ Seun Opejobi, “IPOB Clears Air on Killing 128 Security Personnel in Imo,” <https://dailypost.ng/2021/06/10/ipob-clears-air-on-killing-128-security-personnel-in-imo/> [2022-04-10].

府的残酷镇压。^①

但是，鉴于分离主义危害极大，尼日利亚政府对比夫拉运动采取高压政策。2013年5月，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将“实现比夫拉主权国家运动”定性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三大极端组织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北部的“博科哈拉姆”（Boko Haram）和西南部的“奥多瓦人民大会”（Oodua People’s Congress, OPC）。^②该组织领导者拉尔夫曾多次被捕，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煽动叛乱罪等多项罪名。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总统则坚称不会与分离主义组织进行谈判。2017年9月，布哈里政府宣布“比夫拉原住民”为恐怖组织，禁止该组织一切活动，并展开抓捕行动，许多成员被捕或被杀。2015年10月，“比夫拉原住民”领导者卡努被尼日利亚安全部门逮捕，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煽动叛乱罪等11项罪名。但是，卡努被捕引发东南部地区伊博族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2017年4月，卡努获得保释后潜逃国外，继续鼓动比夫拉独立。2021年6月，卡努再次被捕，也再次引发其支持者的抗议示威活动。

与此同时，比夫拉分离运动成为外国干涉尼日利亚内政的借口。西方国家对于“比夫拉原住民”是否属于恐怖组织存有争议，有的甚至对其持同情态度，反对将其认定为恐怖主义组织，这对尼日利亚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例如，美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否认“比夫拉原住民”是恐怖主义组织，^③英国也反对将其列入恐怖主义名单，^④大赦国际则谴责尼日利亚政府对该组织成员非法逮捕、法外处决、酷刑和虐待行为。^⑤西方媒体则成为比夫拉运动的传播平台，许多比夫拉运动组织都拥有脸书、推特等社交账号用于宣传分离主义思想。2021年6月，布哈里总统在推特上对尼日利亚东南部叛乱分子发出警告，推特却以煽动暴力为由将此推文删除，布哈里总统遂下令以“传播错误信息和假新闻”为由无限期封停推特，美欧西方国家则对此举表示遗憾，它们干涉别国内政的企图暴露无遗。

① Ayo Osisanwo and Osas Iyoha, “‘We are Not Terrorist, We Are Freedom Fighters’: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ro – Biafra Protest in Selected Nigerian Newspapers,” *Discourse & Society*, Vol. 31, No. 6, 2020, pp. 637 – 638.

② Mark Amaza, “FG Moves to Ban OPC, MASSOB,” *The Herald*, May 31, 2013.

③ Abdur Rahman Alfa Shaban, “Pro – Biafra Group Not a ‘Terrorist’ Organization, But U. S. Backs United Nigeria,” <https://www.africanews.com/2017/09/25/pro-biafra-group-not-a-terrorist-organization-but-us-backs-united-nigeria/> [2022 – 04 – 15].

④ Premium Times, “Desist from Backing Nnamdi Kanu, IPOB, Nigerian Govt Warns Foreign Nations,” <https://www.premiumtimesng.com/news/headlines/491171-desist-from-backing-nnamdi-kanu-ipob-nigerian-govt-warns-foreign-nations.html> [2022 – 04 – 15].

⑤ Amnesty International, “Nigeria: ‘Bullets Were Raining Everywhere’ Deadly Repression of Pro – Biafra Activists,” <https://www.amnesty.nl/content/uploads/2017/02/AFR4452112016ENGLISH.pdf> [2022 – 04 – 15].

结 语

比夫拉分离主义运动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形成原因非常复杂，表现形式随着时代变迁在变化，对尼日利亚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深远。民族国家构建本质上是建立一套国家层面的保护性社会体系，提供安全保护和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内部秩序和社会稳定，为个人、家庭和整个社会提供福利是国家的三大职能。^①比夫拉战争的教训告诉人们，推进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努力培养共同的文化认同，增强文化纽带；培养民族共同体，增强民族认同；培养国家共同体意识，增强国家认同。二是制定和实施公平、公正、团结的民族政策，并且真正得到贯彻执行，维护各民族的利益，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民族融合和共同发展。三是抵制外部势力的干涉。摆脱外国的政治控制和争取民族独立，全面提高本民族国家的综合实力并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民族主义的两大目标。^②然而审视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发展历史，它们虽然实现了政治独立，但在经济上仍然有很大的依附性，加之安全能力脆弱，都容易引发外部势力干涉。可以说，独立自主是民族国家构建的前提或基础，而民族国家构建的一大目标也是捍卫和增强独立自主，免遭外部干涉。总之，分离主义不仅在尼日利亚存在，而且在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也存在，它们的现代化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依然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贺杨 责任校对：凌荷)

① [美] 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王建娥、魏强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② 李安山：《非洲民族主义研究》，第168页。

the Horn of Africa have experienced persistent violent conflicts, terrorist and extremist activities, as well as continuous extreme climate disasters such as droughts, floods and locust invasions.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 – 19 pandemic and the Russia – Ukraine Conflict have deteriorated the refugees’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and the number of refugees and the displaced is increasing year – on – year. The unbalance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overty and high inflation have severely restricted the pea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in the Horn of Africa and restrained the abilities of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 solve the refugee dilemma.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to deal with the dilemma of refugee governa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levels. Countries in the Horn of Africa should push forward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find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stay on the African Union’s target to silence the guns by 2030, achieve a conflict – free region, and create a beautiful and peaceful home for all the people in the region.

Keywords: The Horn of Africa, refugee crisis, refugee governance,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Author: Zhang Mengying,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Institute of West –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China – Africa Institute (Beijing 100101).

The Biafran Separatist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Nigeria’s Nation – State Building

Zhang Yongpeng and Liu Yuhan

Abstract: Nation – states are the main actors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nation – state building is a process in which state building and nation building go on synchronously. Nigeria is an important country in Africa, but it is a country “made up” by several former British colonies. Up to now it only has 60 years of history, and its nation – state building process is particularly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The Biafran separatism has long existed and has launched wars or movements, which has become a major problem or challenge affecting the unity and stability of Nigeria and its nation –

state building. The legacies of colonial rule, the harm of tribalism and the influence of interest competition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Biafran separatist movement. The Biafran War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Nigeria's nation – state building. On one hand, it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avoiding the division of the country and has maintained the national unity. Howev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war has caused major casualties and property damage, inflicting a great deal of trauma on the entire country and nation. The war has become heavy historical memory for the Igbo and many other minorities in south – east Nigeria, and has also become the root of the resurgence of the Biafran separatist movement in the late 1990s.

Keywords: Nigeria, the Biafran separatism, the Biafran war, nation – state building

Authors: Zhang Yongpeng, Professor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Liu Yuhan, Master's Candidate a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Ethnic Conflicts, Extremism and Security Situation in Mali

Chen Along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Arab Spring took place in 2011, the internal ethnic issues in Mali have triggered armed conflicts, mainly represented by the Tuareg rebellion in the north and the herder – farmer conflicts in central Mali. Those conflicts are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interacting factors including natural, geographical, social, historic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ones. Extremist groups in Mali and bordering countries have conducted complicated and volatile interactions with various actors in the conflicts, as well as establishing various and broad alliances in the local power struggle. The improper policies adopted by the Malian government in tackling ethnic conflicts intensified the conflicts and pushed individuals of certain ethnic groups towards extremist groups. As a result, central Mali is facing a dangerous situation where the Fulani are regarded as terrorists and extremists. Mali will face more tough challenges on its road to realize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